
方法论分组讨论概要

主持人 加加美光行 (KAGAMI Mitsuyuki)

方法论分组讨论以如何对中国学的方法论进行创新为主题，就以下四个论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第1个论点是由沟口雄三教授在他的主题报告中提到的方法论的问题。沟口教授认为应(将历史研究)分为以研究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东西方关系为中心的空间轴(横轴)和以研究传统、现代、未来的历史关系为中心的时间轴(纵轴)这两条轴线。沟口教授认为，过去萨伊德和柯恩在错误的方法论基础上提出了东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这是因为以前的方法论将重心放在东西方关系的空间轴(即 Western Impact)上，而轻视了历史关系的时间轴。因此为了今后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就要求我们将研究重心向历史关系的时间轴转移。

对此，周长城教授认为，的确应该克服东方主义忽视历史时间轴的缺陷，空间轴也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东西方关系的层面上，有必要强调文化比较、体制比较等比较论(研究方法上)的重要意义，创出超越历史学单一学科的跨学科及综合性的方法论。

宇野重昭教授将沟口教授的纵轴与横轴诠释为传统与外来因素之间的关系，认为通过传统的自发性将外来因素予以内在化的方法是极为重要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和外来因素的冲撞必定是不同性质之间的冲突，因此如何用普遍性的用语来解读这种可能性就成为方法论的重要课题。

第2个论点是围绕如何在膨大化的信息中进行选择的方法论问题。沟口教授引用 E. H. 卡的话题提出了如何对历史进行评价的问题，这引起了金观涛教授和刘新教授之间的争论。金教授认为，现代 IT 和高新科技的高度发展带来的全球化造成了信息的透明化和膨大化，这个变化使沟口教授提倡的研究重心转向历史时间轴的主张变得简单了。在此基础上原来处在中国学(金教授用“汉学”来表述)的边缘研究领域的思想史反而成为可以验证并且结合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诸概念(的学科)而衍生出重视时间纵轴的方法论。

对此刘新教授从人类学、或者说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对沟口教授强调的在对历史进行评价中研究者有必要“参加历史”的观点发表了看法。刘教授认为金教授指出的 IT 技术高度发展带来的全球化的进程中，信息情报在膨大化的同时，信息的深度(deepness)却也可能因湮没在数量中反倒变得浅显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宏观方法论(为特点)的思想史的视角考察资料，反而会使得“参加历史”变得模糊含混。比如海湾战争是否发生了战争，围绕这一点法国的一位哲学学者得出了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战争的梦幻般的结论，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为了克服这种缺陷，刘教授认为更有必要从日常生活这样微观的视角出发。另外，IT 技术的高度进化产生了大量的信息，使得研究者选择任何信息的幅度都大大增加，这样评价历史的不确定性反而增高了，所以不应该在方法论上持(过于)乐观的态度。

第3个论点是，针对上述将认识论作为方法论的力点的提法，有学者提出有必要重视存在论的意义。这个论点主要是由刘新教授提出的。刘新教授从人类学的视角强调指出，今天随着IT和高新技术的高度发展在全球范围里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形成了共同化、共有化（的特点），这种变化是前所未有的。这不是中国一家的问题，而来自于全人类的基本生活经验上产生的历史性变化、即与一般的历史过程中的变化迥然不同的非连续性或革命性的历史变化。在这一点上，强调历史认识论、以历史的连续性为前提的沟口教授和金观涛教授的观点就有可能无法充分把握目前在存在论意义上出现的巨变，因此需要创出一种新的方法论。

第4个论点涉及到作为地区研究一环的中国学在方法论上遇到的难题。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要有Madsen教授、Maclean教授、周长成教授和宇野重昭教授。

首先Madsen教授认为，由于在冷战思维下以国民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国际秩序观念在西方世界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冷战中（中国问题）研究者的中国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把中国看成是一个统一的、一体化的国民国家的观念。但是冷战后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现实的中国是一个存在多个民族地区、存在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和贫困地区的极为复杂的多元体。但是中国学还是被当作地区研究（area studies）（的一部分），“地区”概念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特定的地理地域，但是充满了多样性和多元性的中国沿用“地区”的概念就会产生许多不适合（“地区”概念）的问题点。因此更有必要创出一个新的概念，以便运用这个概念将存在大量性质各异的因素的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在这个意义上今后有必要采用新的方法论。另外，要将大量性质各异的因素理解为一个整体，就要求我们探求一个可以将金观涛教授指出的目前（学科）细分化倾向日趋明显的中国学各研究领域重新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方法。

Maclean教授特别强调了作为地区研究的中国学最大的问题就是外国学者在研究中国学的时候在认识上出现的偏差。首先外国人作为局外人、他人，通过自己的视角观察中国，这样在视觉上产生偏差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如果中国学的研究是在一定的基金赞助下进行的话，很容易被这个基金的动机和目的所左右，这也是发生一定程度的认识偏差的重要原因。另外，在面对如同Madsen教授所指出的多样、多元的真实的中国时，外国学者经常不可避免地运用宏观分析的方法或使用统一的单一的概念进行分析，这里面也存在方法论上的问题。

周长成教授认为，首先在（研究）对象充满了多样性和多元性的中国学里，仅仅从宏观的视角进行分析是不够的，有必要运用像刘新教授主张的那样以日常生活为视角贴近中国现实（进行观察）的方法。另一方面，金观涛教授和刘新教授在方法论上的分歧是因为金教授采用宏观的思想史上的方法，而刘新教授则采用微观的人类学上的方法，这恰恰说明了中国学各个研究领域之间在方法论上是存在差异的。因此正如Madsen教授所指出的，应该摸索可以超越不同方法论、纵横于各研究领域的综合性的新方法论。

宇野重昭教授认为，人们早就认识到在地区研究中应该创出一种可以纵跨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综合化的方法论，因此这是一个并不算新的“新课题”。但在现实中，实现这种“综合化”的路径直到今天还没有被人们发现。

针对以上纵轴与横轴的问题、信息膨大化所带来的资料选择上的视角问题、IT 技术高度发展给全球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变的存在论上的问题、地区研究中跨学科的综合化方法论的创新问题等 4 个论点，作为主持人的加加美教授就方法论上的说明责任 (accountability) 的问题进行了概括并提出了以下的意见。

首先加加美教授强调指出将中国学作为外国研究与中国学者将其作为本国研究，两者在方法论上是不一样的。任何学术活动离开了 (研究) 目的都是无法存在的，一般来讲这个目的就是要对这门学科所研究的领域之现状进行变革。这一点正是 Max Weber 在论述价值的自由时所强调的。学术研究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当然也有研究者的主观意识，才试图避开认识偏差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在以变革中国为目的、进行作为本国研究的中国学研究时，如果存在对历史或者对现实社会的曲解，那么因这种曲解受到损害的中国人就会对其研究进行批判，当然也会要求对研究者进行问责。这个过程中研究者因主观产生的认识偏差就会被矫正，研究的实证性也就会得到提高。可是外国学者在从事作为外国研究的中国学研究时，即使出现了脱离实际和产生曲解的问题，有可能因此受到损害的中国人了解这个研究成果的机会却微乎其微，也就不易产生对研究的批判，结果要求对研究者进行问责的事情几乎没有，当然也就无法保证实证性的提高。正是为了克服地区研究中这个不可回避的方法论上的缺陷，将本国研究与外国研究间不同的视角结合起来，对中国学的方法论进行长期不断的学术对话就变得更为重要。

以上 4 个论点都是互相紧密联系的，但与会学者一致同意有必要树立一个可以包容学术领域的多样性以及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的多元性、通过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交流对话 (形成) 的综合性的新中国学，并将此作为方法论组讨论的共同课题。

(刘星 译)